

傣傣族音节文字使用现状^{*1}

韩立坤

【内容提要】:傣傣族音节文字由个人创制,是傣傣族唯一的本民族自创文字,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在云南省维西县,经过近百年的传承,音节文字至今仍在流传和使用。通过开设兴趣课程、设置报纸栏目、加大宣传力度、出版书籍等多种措施,音节文字的使用出现了新情况,民间自发学习的人数有所增长。而署名为“汪忍波”的音节文字石碑文献,则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音节文字已经成为维西傣傣族的符号,具有学术研究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功用。

【关键词】:傣傣族;音节文字;民族文字;文字使用

傣傣族音节文字,傣傣语称为“马当同鹅”(ma44da33tho33bo44),意为“写在竹片上的文字”,根据文字性质,学界一般称之为傣傣族音节文字。傣傣族音节文字主要流行于维西傣傣族自治县。维西位于云南省西北隅,迪庆藏族自治州南端,是全国唯一的傣傣族自治县。

傣傣族人民很早就意识到本民族无文字的状况。长期以来,傣傣族人依靠刻木、结绳等原始记事方式,作为辅助记忆的工具,并一度发展出了刻木信一类具有文书性质的原始文献。^[1]但原始记事方式不能完全取代文字的功用。十九世纪末,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方传教士进入傣傣族地区。为便于传教,传教士创制了两种傣傣族文字:王慧仁(或称王怀仁)以云南省武定县傣傣族语音为基础,创制了一种伯格理文字。1904 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在当地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创制了伯格理苗文。伯格理苗文包括常见的大定字母,字母分为拼写声母的大字母和拼写韵母的小字母。王慧仁根据伯格理苗文的方式创制了格框式傣傣族文,称为格框式傣傣文。英国传教士富能仁和缅甸克伦族青年宇巴托以缅甸北部曼坎一带的傣傣语为基础,将大写字母正反面颠倒,创制出老傣傣文。但是,这两种文字仍然不是由傣傣族本民族创制的傣傣文。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云南省维西县的傣傣族人汪忍波凭一己之力创制出的傣傣族音节文字,才是完全由傣傣族人士自行创制的傣傣文。

汪忍波(又作哇忍波、哇士波或凹士波,1900-1965),云南省维西县叶枝镇岩瓦洛村人,傣傣族农民,少年时期曾学习过傣傣族原始宗教,是叶枝当地傣傣族“祭天仪式”的第二十代传承人和著名尼扒^[2],享有崇高的威望。汪忍波创制音节文字的初衷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在记述生平的《自传》中,汪忍波感慨,“长期以来,傣傣都用刻木记事。刻木不能记人的名字,也不能把一件事记得清楚。一件事刻在木板上,时间一久,过了两代三代,随人解释,就会把真的说成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正由于傣傣是刻木记事,往往会受人欺骗。记在木刻上的一个符号,可以解释成一钱,可以解释成一两,也可以解释成一斤……总之,傣傣族因为没有文字而吃了多少苦头呵!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很深的。”^[3]

音节文字的创制,大约从 1922 年 8 月开始。^[4]经过数年努力,汪忍波终于创制出一整套音节文字系统。这套文字系统包含一千个左右的字符,字符的形体类似汉字,有些字则直接借用汉字,或在汉字基础之上加以改动,成为新字。读写顺序竖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批准号:10BY049)。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223

² ①尼扒,傣傣语音译,指能与鬼神交往的人,即巫师。

³ ②木玉璋翻译,李汝春整理:《汪忍波自传》,《维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 年,第 1~2 页。

⁴ ③关于傣傣族音节文字的创制时间,尚有 1923 年,1924 年等说法。

行由左往右，不分段，不使用标点符号，读时根据具体文意加以停顿。根据文献记录，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基本可以将叶枝当地傈僳语的全部音节反映出来。^[2]为方便教学和推广，汪忍波编写了《识字课本》。此外，他还使用音节文字记录了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傈僳族远古的神话、传说、诗歌、天文历法、占卜等各个方面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祭天古歌》。汪忍波的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填补了傈僳族文献记录的空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傈僳族音节文字出现后不久即被外界所发现。但围绕这种文字一直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2015年5月，笔者亲赴维西进行田野调查，重点调查了音节文字的使用现状。

本次田野调查的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至31日，向导为维西县傈僳研究所的余海忠所长（以下简称余所长）。余所长是傈僳族人，能够熟练使用音节文字，曾参与编写了一些与音节文字相关的书籍。

一、过去调查资料记载的傈僳族音节文字使用概况

历史上，对于音节文字的使用情况，自20世纪40年代起，便开始有过数次调查。

（一）音节文字的发现与早期调查

1943年，叶枝人李兆丰于云南《正义报》发表文章《傈僳族两种文字》，历史上首次较为科学地介绍了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制过程、文字特点及当时的推行状况：“维西属岩瓦洛出了一个发明文字的傈僳人，名叫汪忍波，他天天画，三个月后，创造出三百多个字了，已经流行到了乡间……学习这种文字的已有近千余人。他的读法由左到右，如读字典上的单字，没有成句成语，一字一音，只论同音，不论同意义。”^⑤

1945年，张征东等人在对傈僳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调查时，也在叶枝当地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些调查，搜集了部分资料，汇总写入《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1945年10月24日，邀请维西叶枝乡岩瓦洛村哇士波……于十年前创造傈僳文字一种，其要则系将音同之文字以同一形体表示，全部单字约计八百个。现县属之康普、叶枝两乡习之者渐多，唯哇士波因为普通之农民，故未能以全力从事此种文字推广，是目前各处识者约三百人左右。”^⑥值得一提的是，汪忍波在《自述》中提到“省里来了一个委员，把我叫过去反复盘问”^⑦，疑似指的就是张征东的此次调查。

（二）建国（1949年）后对音节文字使用状况的调查

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时称中央民族学院）派出调查组到维西对音节文字进行调查。1954年，汪忍波去昆明参观，木玉璋等人见到他本人，并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般性了解。^[3]1957年，木顺江亲赴维西，汪忍波告诉他，“藏族有文字，纳西族有文字，我们傈僳族没有文字，我要创制出一种文字，写在竹片上。”^[4]中央民族学院傈僳语班的师生也曾对音节文字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是，建国初期的这几次调查，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音节文字本身，至于汪忍波和弟子们用这种文字记录了什么，尚不得而知。

对音节文字的大规模调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木玉璋亲自前往维西，维西县高度重视，抽调蔡武成、余胜祥和余友德等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汪忍波的家乡叶枝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一个多月，广泛访问了汪忍波的亲属、授业弟子及当地群众，搜集到了一大批音节文字的书写材料。调查组回到县城后，对搜集的文字和

⁵ ①李兆丰采写报道《傈僳族两种文字》，原载云南省昆明市《正义报》1943年11月16日副刊《边疆》栏目。

⁶ ②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写：《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86年，第144页。

⁷ ③木玉璋翻译，李汝春整理：《哇忍波自传》，《维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年，第11页。

口头材料进行整理，发现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傈僳族《祭天古歌》中《造日造月》等九部古歌的文献。^[5]调查组认识到了音节文字文献的重要性，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搜集、整理和研究音节文字文献上。

1983 年，木玉璋、蔡武成和余胜祥再次前往叶枝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组搜集到十二块薄木板，记录了《祭天古歌》的提纲（每句开头的两个字）。据知情人讲，当年汪忍波就是手持这些模板吟唱祭天古歌。调查人员请汪忍波亲传弟子鱼亲龙等几位老人按照“提纲”逐一吟唱，做了录音，带回维西县后进行记录、整理和翻译工作。^⑧

对于音节文字的很多描述基本来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几次调查。例如，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的语言文字编，介绍了音节文字的创造推行和文字特征，并附有《识字课本》单字；人物编中介绍了汪忍波生平。^[6]其后很多关于傈僳族音节文字和汪忍波的科普性介绍，都是基于《县志》的记载。

这次调查过后，维西县的汉刚等人还多次下乡进行调查，继续收集了一些音节文字的文献材料。2004 年夏，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慧宜在撰写博士论文《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时，也曾到维西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汉刚的支持下，高慧宜对音节文字的本义进行了考释。以此为基础，论文第一次对傈僳族竹书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木玉璋编著的三卷本《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将此前的调查成果汇编成书，也是一部系统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的专著。

综上所述，此前的数次调查，对傈僳族音节文字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做了大致了解，搜集和整理了部分音节文字文献。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音节文字的使用状况却缺乏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其现状如何并不为人所知。

二、傈僳族音节文字使用现状调查

笔者主要调查了维西县保和镇，保和镇拉河柱村老鸦树组，叶枝镇的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和新洛村瓦口组。

（一）保和镇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笔者首先来到维西县傈僳族研究所。维西县在 2012 年成立了傈僳族研究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和挖掘音节文字，共有六名在编人员。笔者主要访问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蜂先生。

蜂先生，39 岁，傈僳族，对音节文字比较熟悉。在出版《祭天古歌》等音节文字书籍时，他对音节文字开始产生兴趣，进而萌生学习的念头。蜂先生主要依靠自学，遇到问题就向所里的余海忠、汉刚等人请教。为了便于向群众中推广，他在《维西报》开辟了一个栏目，不定期地介绍数个音节文字。除了研究所的工作，蜂先生还在维西县民族小学代课，教授老傈僳文和音节文字。在其带领下，笔者到民族小学旁听了一堂音节文字课。

维西县民族小学位于保和镇的北部，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小学，只有四、五、六三个年级，共六个班，约有师生三百余人，包括傈僳、纳西、藏、汉、彝、普米、怒等民族。据蜂先生介绍，民族小学在 2014 年首次开设音节文字课程作为课外兴趣班，每班每周上一次课，持续整个学期。音节文字课有专门的教室，共有两位老师授课，课本采用傈僳族研究所自行编写的《傈僳族音节文字识字读本》。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教师先教授老傈僳文，以此为基础，再学习音节文字。音节文字课主要在于提高学生兴趣，不设考试，平时会做听写检查。笔者旁听时，这个五年级班已经学了一百多个字。

下课后，蜂先生告诉笔者，有的同学积极性很高，会在课下主动学习音节文字。他同时提到，音节文字课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教师人手不足，只能请如蜂先生这样的校外人士担任，急需音节文字的专职教师；其次，由于只是兴趣课程，不做

⁸ ①维西傈僳研究会选编：《祭天古歌》（内部材料），1999 年，第 878～880 页。

考试要求，所以课时经常被主科（语文、数学等）占用；再次，民族小学的学生最多只学习三年音节文字，升入初中后缺乏后续课程。

此外，蜂先生还介绍说，从 2014 年开始，叶枝镇也有小学开班进行音节文字教学，但与维西县民族小学的方式有所不同。叶枝镇的小学使用汪忍波编写的《识字课本》作为授课材料，请音节文字传承人教学。不过，因为《识字课本》对学生而言程度较高，传承人也没有受过师范教育，对授课方式并不了解，因此效果不如维西县民族小学理想。

（二）保和镇拉河柱村老鸦树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拉河柱村老鸦树组位于保和镇附近的山上，距离保和镇不远。受访人余先生，63 岁，傈僳族，原来居住于叶枝镇梓里村白马洛组，父亲是汪忍波的学生。余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参与过木玉璋的联合调查组，在叶枝一带对音节文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余先生会讲汉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曾在当地和云南省的报纸、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笔者向余先生询问了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情况。他自述当时在叶枝乡的医院工作，十分忙碌，县里来人劝说后才参加了调查工作。在调查组工作时，他多次下乡，收集了相当数量的音节文字文献。余先生幼年时见过汪忍波，对他还有依稀印象。他回忆说，汪忍波个子高高的，穿着傈僳族的条纹衣服，靠墙而立，比较沉默，但非常慈祥。

另据蜂先生告知，余先生家中藏有两本音节文字文献，轻易不对外展示。余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本音节文字文献。文献为白棉纸，经过辨识，标题为《傈僳故事书》，写于 1983 年，书中绘有图画两幅。

（三）叶枝镇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叶枝镇位于维西县北部，镇政府所在地距保和镇约有八十公里。汪忍波故居所在地叶枝镇岩瓦洛村，后改名米俄巴，现划归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当地人习惯上还是称之为米俄巴。开谷米二组在叶枝镇北部的山上，紧邻澜沧江。

余所长首先带领笔者拜谒了汪忍波夫妻二人的合葬墓。汪忍波墓位于一处山间小平原，没有道路通往墓地，必须步行。山间林木繁密，在路上，笔者发现有棵较为高大的树木上悬挂着音节文字木牌。据余所长介绍，这是附近傈僳族群众举行祭祀仪式所使用的物品。木牌较新，字迹清晰，应为最近几年悬挂。汪忍波与妻子的合葬墓原本不在现在的位置，前几年迁移过去，并进行了重新修缮。墓碑上刻有汪忍波的照片和生平介绍。

拜谒过后，在余所长的引领下，笔者在开谷米二组村中见到了受访人燕先生。燕先生，50 岁，傈僳族人。其家门口挂有音节文字书写的木牌，经询问，木牌的内容为《养畜经》。房间内也挂有音节文字木牌两幅。燕先生能够识读音节文字。他向笔者出示了一个黑色皮封面笔记本，里面是他工整抄写的音节文字，大约有四十页。燕先生说，他先是向汪忍波的徒弟学习，后又向汪忍波之孙阿双双学习了音节文字。20 世纪 50 年代，燕先生的父亲做村中的集体保管员，需要记录物资、粮食等，但不通汉语，不晓汉字，所以也曾向汪忍波学习音节文字，并使用其进行记录。

在采访中，燕先生提到的一件事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燕先生说，他在 2013 年发现了刻有音节文字的石碑，石碑署名汪忍波和噶麦波（音译），主要内容为预言。他回忆说，当时山下老陈的媳妇（即新洛村瓦口组的余女士）给了他五十斤米、烟一条和鱼等物品，请他和阿双双出工，去附近山上的旧矿洞寻矿。他们花了两三天时间，没有找到矿，但在一个垮塌的矿洞里发现了石碑。发现石碑后，阿双双在洞口插上松枝，挂了一个写有音节文字的牌子，做“尼扒活动”（即傈僳族原始宗教祭祀）。经燕先生辨认，牌子上写的是《识字课本》的内容。他猜测阿双双此举是要向汪忍波告知石碑已经挖出来了。后来，余女士给了他一百元钱，换取了石碑。

在燕先生的带领下，笔者又见到了另一位受访人熊先生。熊先生是汪忍波的亲属，六十多岁，为村中唯一的尼扒。笔者向他询问了尼扒的传承情况，熊先生介绍说，他是本村第三代尼扒，他向前代尼扒学，前代尼扒向汪忍波学。如果前代尼扒健在，他是不可以主持祭祀仪式的。熊先生会吟唱《求雨》等经文，主持村中的祭天仪式、求雨等活动。在笔者的要求下，他吟唱了《招魂》中的一小部分。关于音节文字，熊先生以前跟随汪忍波的徒弟学习过音节文字，后又向汪忍波之孙阿双双学过，可以识读，但不怎么会写，偶尔会使用汉字记一点发音。熊先生还回忆了汪忍波在世时教授音节文字的情况。他说，记得小时候大家围坐在火塘边，汪忍波在灰上写字教授。若大家学会，则擦去旧字，再写新字。但由于时代限制，当时只能私下偷偷授课，不能公开教学。

熊先生的女儿熊女士，27岁，正打算学习音节文字。熊女士告诉笔者，有次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同人聊天时提起汪忍波和音节文字，但对方却以为她是同乐村^⑨人。熊女士向笔者反复确认，一定要写清楚汪忍波是新洛村人而非同乐村，她认为这点至关重要。

笔者还向燕先生、熊先生和熊女士询问村中是否有过纳西族人，均得到否定答案。他们称米俄巴是纯傈僳族村，从没有外族人。

（四）叶枝镇新洛村瓦口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新洛村瓦口组在开谷米二组的山脚下，紧靠澜沧江。余所长带领笔者拜访了受访人陈先生和他的妻子余女士。陈先生，64岁，傈僳族，做过村主任。余女士以前在白济汛^⑩供销社工作，口才很好，会纳西语，懂一些“纳西规矩”^⑪。

陈先生家中供奉着一幅汪忍波的坐像，并有香炉一尊。余女士称香炉是汪忍波的遗物，为其亲手所做。笔者询问了发现石碑的过程，与燕先生的叙述基本一致。笔者提出想看一看石碑，陈先生说，因为石碑贵重，所以藏到了山上，只有周末时才会取回来。陈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块状似甲片的物品。此物与石碑同时出土，金属质地，银色，类似古代盔甲的某部分，但无法分辨究竟为何物。

三、调查结论

经过本次对傈僳族音节文字的调查，笔者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音节文字仍有人使用

先前学界认为，随着教育普及，使用音节文字的人逐渐减少，甚至已经消失。然而，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民间自发学习、使用、传播音节文字的情况并不罕见。叶枝镇傈僳族人的宗教活动中，使用音节文字书写的木牌作为宗教物品。一些傈僳族人主动学习音节文字，如蜂先生，出于兴趣，自学了音节文字；又如熊女士，正准备着手学习。民族小学的一些学生通过音节文字课程也产生了兴趣，也会在课下主动学习。

维西当地傈僳族群众对音节文字有强烈的认同感。虽然能够识读的人数并不多，但音节文字和汪忍波在当地享有很高的

⁹ ①同乐村，又称同乐大村，位于米俄巴村相邻的山上，是澜沧江流域一处保存完好的傈僳族大村。近些年来，同乐村依托傈僳族特色，开发旅游资源，吸引了不少游客，因此较为出名。同乐村中建有一处广场，有汪忍波塑像和音节文字，也有音节文字的展览馆，但汪忍波本人并不是同乐村人。

¹⁰ ②白济汛，维西县七个乡之一。

¹¹ ③即纳西族的风俗习惯。

知名度。笔者在保和镇和叶枝镇进行调查时，余所长介绍笔者来历，提到“音节文字”，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汪忍波的名字。笔者在保和镇随机采访几位路人，他们也知道路牌上的字是汪忍波所创的音节文字。有一在维西县做生意的四川人，笔者向他询问，他虽然答不出汪忍波和音节文字，但也可以说出路牌上是“一个傣傣人自己造的字”。

（二）过去的某些记述和结论不准确

在过去，对于音节文字的记述，多源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之类的已有资料，由于年深日久，出现了一些不够准确的描述和结论，与实地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不符。

例如，木玉璋、高慧宜等学者在考释音节文字字源时，认为有一部分来自纳西哥巴文。木玉璋甚至提出，有部分音节文字字符源于贵州老彝文。但实地走访时，汪忍波所在村的村民告诉笔者，村中从未有过纳西族和彝族居住；而且，汪忍波所学习的傈僳族原始宗教，也与纳西东巴教无关。村民反映，之所以有“东巴”的称呼，是为了便于向笔者这样的外族人解释“尼扒”的含义，实际上，纳西族做纳西族的宗教仪式，傈僳族做傈僳族的宗教仪式，东巴是东巴，尼扒是尼扒，二者不同，几乎不存在相互学习的情况。至于彝族，当地几乎没有彝族，更没有听说过彝族使用的文字。这也符合县志的记载，彝族迁入维西的时间最早在1923年，迁入地也不在叶枝。此时汪忍波已经开始创制音节文字，借入老彝文字符的可能性极低。

（三）发现了新的音节文字文献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音节文字文献。2013年燕先生和阿双双共同发现的音节文字石碑，当属首次发现的音节文字石刻文献。石刻署名汪忍波和嘎麦波（音译），字体秀丽，内容为预言。但是，石碑埋入矿洞的时间、原因，另一署名者的身份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四）音节文字使用出现了新情况

除了民间自发学习和传承，维西县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开始尝试推广音节文字。例如，路牌、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在汉字和老傈僳文外，加入音节文字。在维西县民族小学，开设音节文字课程，引发学生兴趣，利于音节文字的传承。在报纸等媒体，也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定宣传。维西县傈僳族研究所的汉刚、汉维杰还尝试将音节文字与计算机结合，开发了音节文字输入法，目前已初见成果。

参考文献：

[1]韩立坤：《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3~137页

[2]高慧宜：《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3][5]木玉璋：《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7、54页

[4]马效义：《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

[6]云南省维西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849~864页